

把雨果踢出局的“不朽者”



[法]阿明·马洛夫著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
马振骋译
文汇出版社
2019年7月

击败大文豪维克多·雨果

1840年2月，维克多·雨果已经大名鼎鼎，在第三次参选，即选举法兰西学院第29把椅子主人米肖的继任者时，还是输给了皮埃尔·弗卢朗。这怎么叫人不遗憾呢？事到如今，那位大人物的对手早已无人知晓；但是因此得出结论说那个时候的院士选择了弗卢朗有损形象，这话也欠公允。

作家的失败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他的对手很聪明，不在文学价值上与他较量，而是推出一位学者、一位杰出的生理学教授与他对垒。教授的讲座吸引广大听众，此外还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终身秘书。两人得票数非常接近。那天有31名投票人，胜选票数是16票。第一轮雨果得14票，第二轮得15票，第三轮得14票。弗卢朗依次得了14票、14票、15票。只是到了第四轮，科学家才以17票对12票赢得了竞选。

对诗人来说，入选只是暂时搁置而已，十个月后他在其他席次的选举中胜出。但是当时，他的崇拜者大为恼火。那时一张报纸愤愤不平说：“在法兰西学院不是来求立方根的，黎塞留创建学院时，绝不会想到要用上那些曲颈瓶和实验工具！”

其他文章写得更俏皮，也同样犀利，哀叹一位卓越的生理学家“心甘情愿卷入一桩阴谋，给一群对科学一知半解的文人、一些写喜歌剧的打油诗人和生闷气的保王党组成的联盟利用，出面选举”。

当然，弗卢朗教授当选依靠的是策略。但是法兰西学院里出现一位科学家，那也不是什么出格、反常或者引人非议的事；这也是新院士在入选演说一开头便热情洋溢所表达的。

“先生们，

“在我们的国家，文学与科学随着语言开始结成联盟了。”

笛卡尔在17世纪一下子创造了一种新的几何学、新的哲学和新的语言；在18世纪，哲学家丰特奈尔叫人以通俗语言来谈科学；博物学家布封谈到科学非常雄辩；伏尔泰的语言更是给牛顿的名声插上了翅膀……

“从科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超越科学本身，先生们，这岂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吗？岂不是对一切都产生了影响吗？”

“对哲学来说呢？大家已经看到是一位几何学家奠定了新哲学。”

“对语言来说呢？也是这位几何学家，写出了《方法论》，这就是我们的语言采取了新形式的第一部著作。给予这个新形式以令人惊讶的高度与完美的，也是一位几何学家，他就是《致外省人信札》的作者帕斯卡！”

“最后对历史又怎么样了呢？上一世纪的一位哲学作家大卫·休谟主张历史要服从于科学的方法；由于历史服从并以事实为依据，在我们今天取得了新的起飞；无疑，这样的事实是不需要证据的，但是在我今天要谈到的著名院士的最重要作品中却找到了最充分的证据。”

这位演说者最后话头一转，显然是巧妙地谈到所有入选演说中的“实质性内容”，即对前任的赞扬。这是十分得体的，因为他说了一部丰

富详尽的资料著作——米肖的《十字军东征史》得到这方面的公认，事实上也提供了一个把科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良好范例。

这就是1840年12月3日那天，聚集在法兰西学院圆顶下的听众记忆中关于这次演说的开头几段话。他当选而维克多·雨果出局，引起一片嘘声，大家期待这位新院士总会以某种方式对此作出回应；但是弗卢朗不满足于只为自己入选辩护，他还用寥寥几段话提出一个真正的文明现象。他超越“古典派”与“浪漫派”的争论，以及共和派、波拿巴分子、奥尔良派或正统派之间的争论，超越不可避免的人身攻击，要他的同仁们知道一个新世界正在兴起；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包括它的精神、方法、应用——正在起一种决定性作用。不仅仅是在知识或教育的领域，在法国，如同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国家，机器的普遍使用将要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关系，产生新的政治与哲学学说，同时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麻醉学领域的先驱

法兰西学院这些带偶然性的选举，后来使第29把椅子在19世纪以至于20世纪，由于有一连串在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加入，成为这个变化的幸运见证人。

在我们的眼里，皮埃尔·弗卢朗的星光自然与后文将出现的克洛德·贝尔纳、埃内斯特·勒南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不同；但是他的成就绝对不可忽视。这里不说别的，光说他对近代医学一项重大技术的完成作出的贡献，那就是麻醉学。麻醉在我们今天是那么普遍，那么平常，很难想象那些灾难年代外科大夫要给病人切除胆囊或者截去一条腿的时候，病人是醒着的，痛得怪声大叫。弗卢朗是第一批研究氯仿性能并介绍给医学界认识的人。

麻醉术的发明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就像其他类似的技术一样，它是一种观念长期酝酿与实验的结果。我们也不可以轻视在这前进过程中促成知识与实验向前迈进一步的任何人。在科学与技术中，每个研究员都是一只高贵的齿轮，虽则我们向某位科学家及他的工作、直觉或天才致敬是理所当然的，但也要记着一项发明永远是长期逐步改进的产物；如果说新理念总会让人看到旧思维的缺陷，新理念到时候也会被后来的理念超越，抛在后面。

然而，在艺术世界与科技世界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么？艺术变化更替，但是不一定可以说是进步。19世纪在洛杉矶完成的一件雕塑，并不会使2500前在雅典完成的一件雕塑遭到淘汰；毕加索的画并不会使法国拉斯科的岩壁画陈旧；今日的诗歌也并不会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落后于时代。反过来说，19世纪外科大夫使用的技术，对今日医生来说，实实在在是要“遭到淘汰的”，看来“陈旧”，并“落后于时代”。科学从发展的模式来看，注定是集体完成的，绝大部分人默默无闻。这毫不贬低个别发明家的天才，也毫不轻视每个时代推动发展的个人价值与贡献。

说到弗卢朗，他看来有准确与创新的直觉。他把醉鬼与抽鸦片者的行为进行比较时，观察到前者是“行动上醉”，后者是“感觉上醉”；对鸟进行的实验使他得出结论，酒精影响到小脑，而鸦片影响到大脑半球。长久以来大家都认为脑子是一团密集的球体，而很不注意组成大脑的区域，也不注意每个区域的特殊功能。幸亏有了像弗卢朗这样的学者，他们即使不能总是提供正确的答案，至少会提出正确的问题；一条令人振奋的道路得到了开拓，继续探索下去，每天会带来一点希望。以此来说，他是今日麻醉学领域的先驱。

挫败“伪科学”

在这个陌生的领域，他满怀热情，小心翼翼往前走。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这样做。深入曲曲折折的脑区的科学研究已开始风行。有一个新问世的理论，创立者是德国医生弗朗茨·约瑟夫·加尔，声称在新发现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的观念，称为“颅相学”，在19世纪上半叶红极一时，其影响远远超出科学范围。他的奠基性作品从1810年起在巴黎用法语出版：《关于一般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根据颅骨构成的观察，了解人与动物的若干智力禀赋与道德倾向的可能性》。加尔与他的合作者深信，根据大脑部位的“隆凸”，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犯罪、懒惰、宗教信仰或夫妻不忠等方面倾向性。

说君子(22)

(五)由于义者为君子。所谓的“由于义”就是遵循义而行事。在儒家看来，“居仁由义”是包括君子在内的士、大人等必备的德行。孔子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之论，按照“居仁由义”的逻辑，我们亦可以有“君子去义，恶乎成名？”之论。

1. 仁义是君子之共名及其德行。在儒家思想中，“义”德总是与“仁”德紧密相连。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亦正是在于他们是以“仁义”为其核心价值观的。“儒家者流……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特别在亚圣孟子那里，常是“仁义”相连来论述自己的思想，并也将“仁义”之德的同时具备以及践行视作与包括君子在内的并与君子相近的士、大人等的标准和品质。孟子在回答“士何事？”，即士做什么事的问题时说：“尚志”。即士要使自己志行高尚。而所谓“尚志”就是“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就是说，士要想使自己志行高尚就应该按照仁义去行事。具体说来，杀一个无罪的人，这是不仁；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叫不义。人应该居住在仁的屋子里，人应该行走在义的道路上。做到了以仁为家，以义为路，那么，士、大人的工作就齐备了。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正是将“由仁义行”的主体视为君子。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是说，人与禽兽的差异是很少的一点点，一般百姓丢掉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性情，于是从仁义之路而行，不是把仁义作为工具、手段来使用。儒家另外的经典也多处明确指出了君子是实行仁义的主体。《礼记·表记》说：“其君子尊仁畏义”。荀子说：“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荀子·大略》)，是说君子用义来处理仁，然后才是仁；根据礼来实行义，然后才是义。

可见，“居仁由义”“由仁义行”遂成为君子等高贵之人所安处的场所和行走的道路，因而也才成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内在品质。能够内心存仁者，能够居住在仁里者，能够依照仁者可称为君子。我谓之“居于仁者为君子”“依于仁者为君子”。与此相联，能够行事循义者，能够行走正路者，能够凭借道义者当亦可称为君子。我谓之“由于义者为君子”。

既然“居仁由义”“由仁义行”成为儒家及其君子实行的原则，那么必然地会受到儒家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孟子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让人们时刻重视着人之为人的精神家园和必由之路的维护和建设。孟子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还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孟子这里是要提醒人们：自身不能遵循仁义行事的，叫做自己放弃自己。然后形象地告诉人们：仁，是人最安适的住宅，是人之为人的本心；义，是人最正确的道路，是人之为人的大路。最后警告人们：人类最可悲的事情，是把最安适的住宅空着不去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不去走！

荀子与孟子一样是将“仁”看作是人安适居住的房子，而将“义”看作是人出入的门户。荀子说：“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虚之，非礼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荀子·大略》)，荀子要明示人们：仁有安居的地方，义有出入的门户。荀子是要警示人们：仁如果不是它安居的地方而呆在那里，就不是仁；义如果不是它出入的门户而从那里出入，就不是义。

“居恶在？”“路恶在？”，即住处在哪里？道路在哪里？这是向社会与人类发出的最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智慧也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中得到了展现。

要之，君子是人性的体认者。“君子性所，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君子是良心的保存者，“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此之谓也；君子是仁义的实行者，“君子存之……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此之谓也。“由义”就是要求人走正道，要求人走人路。“义，人之正路也”“义，人路也”，此之谓也。而君子则是这条道路的引领者和表率者。正道、人路即是所谓“道”也，“德”也。所以，“由于义”的君子必然地就肩负起遵道行德的神圣使命。“君子遵道而行”(《中庸》)，“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大学》)，此之谓也。



徐小跃 (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61)